

念日,“用国家立法形式把它作为节日规定下去,传之后代”。^①当年8月1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视察了抗战纪念馆和卢沟桥。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视察抗战纪念馆。此后,国家领导人多次到馆视察,抗战纪念馆成为我国重要的抗战纪念仪式举办场所。19年后,大年同志的另一提议得以实现。2014年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确定每年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大年同志在其晚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思考和探索,这一永无止境的求真求实,显示了他的学者本色。他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总序中写道:“就像历史本身永无穷期那样,人们认识历史至少一些方面也无穷期,以致终究要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这只会促使有志者去勇于探索,发现真理,而不会裹足不前。”这是大年同志在晚年对他自己的鞭策,也是对历史研究后来者永恒的期待。

我相信,我和近代史所的同仁们一定不会辜负这一期待。近代史所严谨求实的学风定会代代相传。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

李 建 傅永聚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学院)

在现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所谓的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视域的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亦不例外,他的晚年著作《评近代经学》,对近代经学进行了宏阔、深邃、缜密、独到及精辟的思考和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典范。但迄今为止,其近代经学研究在学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当前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近代经学开端问题、近代经学研究的方法论、近代经学研究的重心及现实指向三个方面试做评述。

一

近代经学的开端问题,虽不是《评近代经学》关注的重心,但却是刘大年近代经学研究独具匠心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他的致思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而展开:

第一,龚自珍、魏源与庄存与、刘逢禄孰可标志近代经学的开端。刘大年认为,庄存与今文经学著作讨论的问题,对近代经学毫无影响。刘逢禄闻名,是因为所著《左氏春秋考证》否定古文经学,成为近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焦点之一。龚自珍、魏源向刘逢禄学到的仅是今文经学文献知识,思想上与其并非一脉相联。龚、魏学问的重点在于社会现实问题,而这正是刘逢禄极力回避、不敢碰触的。乾嘉今、古文两派尽管存在诸多相异处,但在拘于书本、远离现实这一点上有着一致的表现。近代今文经学则与之有别,它集中反映着当时急剧变动的社会结构和激烈斗争的现实矛盾。这是刘大年在回应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关于近代今文经学开端于庄存与、刘逢禄,因而“必须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②时提出

^① 《致江泽民》(1995年5月15日),《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622—623页。

^②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的观点,也是刘大年研究近代经学从龚、魏开始的依据和出发点。

第二,近代经学何以不能从龚、魏同时代的其他经学家讲起。刘大年认为,与龚、魏同时期的凌曙、陈立等人在经学研究方面确实做了不少搜集材料的工作,然而包括经学研究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工作,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以其自身所提供的知识更好地推进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而学术研究所提供的知识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决不能仅靠反复重演旧文去实现。宋翔凤、凌曙等人的今文经学,名之曰微言大义,通经致用,其实仍没有脱离书本的旧套,像龚、魏那样参加到时务论说里去讨论“世情民隐”,对他们而言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近代经学只可从体现近代最早思想解放萌芽的龚自珍、魏源讲起,而同时代的其他公羊学家却不能排列在内的缘由所在。

第三,龚、魏为何仅意味着近代经学的萌芽。龚自珍曾被梁启超比作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刘大年认为,两者完全不能相比。因为,卢梭提出“主权在民”,扮演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先驱的角色,龚、魏所处时代,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与欧洲相比在历史发展进程上整整落后一个阶段,所以根本谈不上存在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民主要求。龚自珍、魏源充其量只可归为“地主阶级的怀疑派或改革派”,他们集经学研究与时务讨论于一身,融尊崇、宣传孔学与间接批评孔学于一体,近代思想解放的萌芽“因之出现”,“这是他们的功劳,但也仅仅到此为止”。^① 所以,这是在确定近代经学的开端时,应当自觉意识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刘大年关于近代经学起点之确立问题的讨论,其实涉及学界曾经热议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起始问题,而他通过近代经学研究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是他一直坚持的鸦片战争开端说,所反对的16世纪以来(或明清之际)中国近代开启说。刘大年的鸦片战争开端说虽然同学界所谓的“冲击—反应”说、“侵略—革命”说等有某些暗合与相通之处,都重视和强调外力因素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剧变,但他的鸦片战争开端说所赖以成立的根据却自成一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统治形成及其开始没落、消灭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近代以来产生的资本主义与明清时期萌芽的资本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基于此,近代发端于16世纪以来(或明清之际)的说法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某些学者在鸦片战争以前寻求中国“内发原生”近代性之努力在方向上的偏失。

二

《评近代经学》在研究方法上最突出的特色在于,以严肃的考证为基础,以明确的现实关怀为旨归,以中国近代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为主线,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于近代经学进行系统、全面、综合的研究。

第一,历史唯物论与近代经学研究。刘大年认为,历史运动是一个整体性的运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部门虽然功能各异,但它们又是也只能是以社会生产、经济生活为核心,彼此连接,共同构成一个相互间无法分割的体系而发生作用。而历史唯物论最基本的观点就在于,首先强调一定时空里的上层建筑必须置于这个整体运动中去看待和理解。^② 《评近代经学》中,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具体的应用,比如,针对艾尔曼的近代今文经学起源于庄、刘矛盾斗争说以及艾尔曼将思想与社会结构有机地、联系地了解的研究模式,刘大年指出,这是一个接近唯物论的出发点,但同时又认为,艾尔曼所谓的“儒学依赖的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结构,只能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①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25页。

^② 参见姜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页。

相联系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基础结构”。^① 社会基础结构变动,人们的思想认识、学术观点随之变动。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都讲今文经学,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觉地与时代重大的矛盾斗争相联系的,而那种矛盾斗争最终又和社会基础结构息息相关。对于后一点,则不是他们自觉意识到的。又如,在《评近代经学》的引言中,他指出,“事物不是要从运动中去认识吗?中国近代历史剧烈变动,近代经学的状况、地位与作用迅速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经学反映出的孔学思想理论的地位与作用是从其他地方看不清楚的。”^②这是主张从事变态势、历史变迁和演进中,用运动、发展、普遍联系而非静止、孤立、形而上学的辩证观点来考察近代经学。

第二,中国近代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与近代经学研究。刘大年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基本国情,可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或两大主要矛盾:其一,“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其二,“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③ 这两大矛盾和问题横亘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不得不应对的一大症结和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运动即围绕这一症结和主线渐次开展起来。而近代经学如何从传统文化中解读出近代社会历史的这种症结,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题眼”或“题珠”。^④ 这在刘大年论述近代经学发展之高潮即近代经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有充分的体现,比如,他指出:在第一场今古文论争中,“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问题”,“由维新派用充满危机感的语言鲜明地提了出来。那就是‘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以及‘振兴实业’的口号和要求”^⑤,问题的关键在于走什么样的道路去达到这一目的。又如,康有为刚一走上历史舞台,就被宣布过时,因为近代中国新的斗争接连兴起,不允许存在古代封建制度那种长期不变的幸运了。说到底,也就是近代两大基本问题已经不是依靠幼弱且带有很大封建性的资产阶级代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所能奏效,它需要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救亡方案的出现。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刘大年在研究辛亥革命史和抗日战争史中,以及在思考近代经学问题时逐渐形成和提出的,“而对近代中国基本问题的深入认识,又为他从近代中国的大框架中评价近代经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⑥,这是一个良好的互动。

第三,关于近代经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刘大年认为,历史总是要以各种方式与现实生活发生关联,不如此,它就不会为人所注意,也就“不成其为一门学问而存在于世了”。^⑦ 在《评近代经学》引言中他又指出:“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中,阐释孔子学说的经学与人们关心的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相隔何止像隔山!如今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评论呢?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有一定的范围。要求对历史上思想理论的评述,如全要直接和现代生活联系起来,将会最终取消学术研究,肯定行不通。孔子思想理论是中国包罗最广的文化资源。评论近代经学虽然不是讲的眼前的事情,但它涉及对孔学的看法和认识问题。”^⑧ 以上论述表明,他对于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间的拿捏是审慎的,这对现代学界无疑也是一剂清醒剂,尤其值得当代经学、儒学研究者重视。目前,在儒学研究方面,学界有两种难以沟通的倾向:一是赋予儒学包打天下之重任,诸如让儒学曲折地开出现

①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7页。

②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4页。

③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2页。

④ 参见姜涛《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7—478页。

⑤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55页。

⑥ 周秋光、黄仁国:《刘大年传》,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307页。

⑦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206页。

⑧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4页。

代化所需的民主与科学,欲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以直接干预现代政治等;一是沉湎于训诂考证,发思古之幽情,以超然为由,割裂了经学、儒学与现实世界天然的关联,从而最终消解掉了儒学的本真。刘大年强调在近代经学的发展演变中考察孔子儒学的现实处境,认为这样能够更清楚地把握孔子儒学的现代价值,他以冷静的理性给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以一定程度的警示。

统观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方法论,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以往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由于偏重于文本自身的研读,与相关语境、时代背景的结合甚为不足,近年来或许因矫枉过正,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刘大年曾经说过一段话,从理论上讲可能有助于纠正这种偏向,他指出,“一切国家、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物质生活、经济结构、社会内部矛盾”,也都有反映这种特定状况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研究、论述历史,缺少了观念形态这个部分,就好比 we 想认识某位人士,但仅仅窥见其躯干,却不知道他的头脑灵魂是什么样子。这当然不能说我们认识了那位人士”。^① 实事求是地说,刘大年的《评近代经学》,是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内在理路”与“外缘情境”深度结合的一个典范。

三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基于特殊的缘由,大陆学界泛起了一股崇儒尊孔的声浪,以儒学指导中国现代化、儒化马克思主义等等的呼声持续不断;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非“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各种否定说、怀疑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的议论也充斥学界。除此之外,当时思想界“崇外”(文化虚无主义)与“泥古”(文化复古主义)的偏颇亦相当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对孔子、儒学、传统文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估价方面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刘大年认为,“每个民族走向现代化,都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根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文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无所不包,作为封建文化支柱的经学,尤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需要研究它,科学地解释它”。^② 由是,如何根据事实讲清楚中国近代经学演进、衰微及最终必然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的整个历程,就成为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重心;如何说明儒学(经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如何论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来龙去脉及充分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就成为刘大年研究近代经学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指向。

刘大年曾多次指出,“孔子思想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不能用投票方式解决,要分析研究”;“儒家思想在今天还有没有生命力,能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精神资源?看来,还需要作深入研究,不宜过早地下一个价值判断”^③;对儒学及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是一件很复杂很重要的工作”^④;中国近代两大基本矛盾的突出,把一切都变得格外复杂,近代经学亦不例外,因此这一情况必须得到充分注意。^⑤ 他之所以如此反复强调,是想表明审慎的态度、客观的分析是近代经学研究所得结论是否具有说服力的必要前提。

关于近代经学,刘大年有一个整体性的定位和评价:近代经学的封建正统性与民族文化性密切相关,难以分割。经学封建意识形态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改造自己,去适应已经发生剧变和正

① 刘大年:《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②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下,第 592 页。

③ 刘大年在《调研资料》(四)上的批注,转引自黄仁国、姜涛《论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历史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31 页。

④ 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海燕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35 页。

⑤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 1 辑,第 106 页。

在持续变化的社会形势的客观要求。然而传统文化之主流的地位和身份,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急剧的社会变动中冷眼旁观、毫无作为,它必然望风而动,参与到尖锐的现实斗争中。如果排除封建文化里的民族性内容,就无法解释近代今、古文经学各自暂时与历史进步运动发生联系的事实。在肯定近代经学之现实性和民族性的前提下,刘大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了近代经学所含有的负面因素、其本质属性及其消亡和更新的历史合理性:

第一,孔子学说集现实精神与复古主义双重性格于一体,其直面社会现实的精神品格在近代经学的开启者龚自珍、魏源身上已初步显示出来;戊戌维新时期今文派、辛亥革命前夕的古文派,更进一步使原始儒学这一积极应对现实的长处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且,他们关心现实的实际意义,正是要投身于矛盾中去改造现实,这是近代经学最值得重视的部分。但是,当反映新的社会势力、寻求中国出路的新思想文化运动兴起时,曾经引领时代潮流或追赶潮流的近代经学今、古文两派却一齐向后转,后悔并放弃当初对于孔学的批判和改造,转而主张尊孔读经,从而与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背道而驰,体现出共同的“复古主义”倾向。近代经学的这种“复古主义”特征,在刘大年看来,是源自原始孔学这一共同的文化基因,它不承认中国社会是发展前进的,肯定小农生产、血缘关系、封闭社会的准则是永久适用不变的。以此而论,复古思想、自我封闭,就成为孔学体系中极大的消极因素。

第二,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但诸如民权、平等之类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字眼却朦胧地出现在近代今文经学中,辛亥革命前夕的古文经学亦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近代经学所以存在着这种形式与内容上的矛盾,无非是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种特有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矛盾以及近代中国新旧相叠的过渡性社会的特点。然而“近代经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孔学名教和它的整个体系,而非民权、平等那些观念”,虽然“民权、平等观念的出现……带来了爆炸性的效应,但它根本谈不上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匹敌。经学的性质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①

第三,近代经学家从总体看仍然把经学方法作为思维的最高原则,他们以孔学经典之是非为是非,以致推陈出新的创造性思维从方法论上被扼杀而无由产生。“西学中源”说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盛行更进一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倘若不从孔学体系之统摄和束缚下挣脱出来,就有可能因为在汲取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陷入困境,而最终妨碍其自我更新。

第四,近代今古文两派经由各自的鼓吹宣讲和相互的激烈论战,客观上暴露了经学固有的诸种不合理性和本身无法克服的重重矛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宣布今文为真、古文为伪,使两千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第一次发生了极大的动摇;辛亥革命前夕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宣布古文为真、今文为妖妄荒诞,不能不使经学的地位再一次受到严重的打击。近代经学这一破除旧思想桎梏的工作,出乎意料之外的正是自我揭露、自我否定,而一切外部学说,都不可能代替经学自身的揭发来做到这一点。在这样的基础和前提下,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迫使近代经学及其内在斗争成为过去,同时又从根本上终结了经学对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统治和主宰。近代经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完成了历史提出的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与中国国情及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刘大年的上述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看待孔子、儒学(经学)、传统文化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首先,既不能因为孔子、儒学、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而对其作简单、武断的否定,也

^①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107页。

不能不顾历史事实,一厢情愿地认为儒学曾经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能够重新恢复。面对当前的传统文化热,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将重视传统文化、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无条件的尊孔读经、文化复古,不能把重视传统文化解读为独尊儒术,“以为儒学经典中句句是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天道、常道,落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陷阱”。^① 我们应该清楚,倘若“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便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近代化”。^② 而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经学乃至未被政治化、官学化的原始儒学,皆为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其自身固有的弱点和缺陷,业已积淀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对其清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

其次,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非本土文化而认定其不属于“中国文化”,更不能因此夸大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认为两者不能共存,以至从根本上敌视和排斥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否认其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在这一点上,刘大年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一些重要提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以后,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如果说,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指两千年来汉文化中的孔子教义、儒家学说,这大概没有好反驳的”,但“中国文化不能只有古代,没有近代。近代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什么?不管人们赞成与否,这样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占着近代中国文化主导的位置”。^③ 而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④,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主流”,这是“历史的选择”。^⑤

刘大年《论康熙》的学术贡献及对清史研究的启示

成积春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论康熙》是刘大年先生1961年发表的论文,被认为是其在学术界引起激烈争论的三篇重要论文之一。^⑥ 50余年后读来,仍被刘大年先生富于思辨、优美流畅的文笔和逻辑缜密、掷地有声的话语所吸引,也为其历久弥新的观点所震撼,并引发思考:50多年来我们的史学研究真的进步了吗?有没有因为思想和方法的混乱而使我们在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不仅没有使问题明晰反而更加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了呢?

一、《论康熙》的主要学术贡献

(一)指出以往对康熙的评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刘大年先生之前,国内外资产阶级保守派和激进派曾撰写过不少评价康熙的论著。这些论著,

① 陈先达:《既要反对文化虚无,也要防止文化复古》,《北京日报》,2010年9月20日,第18版。

②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3页。

③ 刘大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求是》1989年第7期,第13页。

④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明清论丛》第1辑,第112页。

⑤ 刘大年:《说历史的选择》,《求是》1989年第24期,第23—26页。

⑥ 另两篇论文是《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和《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分别发表于《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和《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